

## 导 言

本书从人地关系的理论前提出发，主要运用“地域—家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唐代关中地域文学进行探讨，对与文学发展具有关联性的关中地域文化和关中土族的一些历史事实进行整理，对本地域文学的发生机制重新诠释，在此基础上为唐代关中文学进行定位。

所谓人地关系（man-nature relationship）实际上就是人类社会生活与自然环境交互作用的关系，这是人文地理学及其分支文化地理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文化地理学研究的是一定地理空间范围内各种文化因素的分布结构、形成条件，以及文化景观、文化生态的地域特征、演化发展等内容，并强调文化集团的空间组合机能和地域系统特征，指出地表所发生的文化差异对人地关系具有深刻的影响。其中文化景观、文化源地、文化传播、文化地理区或文化区是研究者最为瞩目的几方面内容，而文化区域的鉴别、定义和分析，又是文化地理学研究的基础。<sup>①</sup>

从文学史学科的角度来理解文化地理学的人地关系，实际上就是承认文学和地理环境的相关性。它包括作家诞生的地域风貌，

参见李旭旦主编《人文地理学论丛》，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5 年版；郭来喜等主编《中美人文地理学研究讨论会文集》，科学出版社 1988 年版；翟忠义、李树德主编《中国人文地理学》，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1 年版；卢云《汉晋文化地理》，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邹逸麟主编《中国历史人文地理》，科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作家分布的地理特征，作品的地域风格，迁徙流动所带来的旧范式的突破，一定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的特殊遭际对作家的综合影响，由方土风气等因素所造成的文化差异在创作上的投射，文学的传播交流所导致的地域特征和空间风格的淡化与消解，由地域性的空间风格向超地域性的时间风格演进过程的规律等等。严耕望曾指出：“唐代南北士风之不同对于唐代政治有深切之影响，而中国南北人文之盛衰尤以有唐一代为关键。欲考唐代政局之演变，推究牛李党派之纷争，最彻底之方法莫过于探求朝廷达宦之出身与籍居。人文之方面甚广，而大体言之，政治人才之多寡尤为人文盛衰之表征，故考南北人文之盛衰，亦莫过于探求朝廷达宦之出身与籍居。”<sup>①</sup>其实，考察南北人文之盛衰，亦可从探求文学风格之地域嬗蜕及作家之出身与籍居中见出。

所谓“地域一家族”研究方法，是文化史学的一种操作技巧，根据笔者的理解，实际上是将文化地理学与社会史相结合而形成的一种“边际研究”。

家族制度或称宗族制度是传统中国社会的一个突出特征。家族的演生变化虽然非常巨大，但在整个前现代社会中，草蛇灰线，仍然具有其一贯性，而其与社会、政治、经济、伦理、文化（包括文学）的影响作用，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称中国为“家族结构式的社会”<sup>②</sup>，许烺光干脆以宗族作为中国社会的代名词，借以比较说明印度的种姓社会、美国的俱乐部社会。

被陈寅恪誉为“清代史家第一人”的钱大昕，曾提出史家所

<sup>①</sup> 严耕望《唐仆尚丞郎表·序言》（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专刊》第36本，1956年。

<sup>②</sup> 见苏国勋《理性化及其限制——韦伯思想引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53页。

见〔美〕许烺光《宗族·种姓·俱乐部》，中译本，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

当讨论者有三端：曰舆地，曰官制，曰氏族。钱大昕所说的舆地即历史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研究，氏族即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史学中的家族研究。陈寅恪认为中国家族伦理之制度发达最早，在中古史研究中，尤其致力于地域与家族关系的探讨：

盖自汉代学校制度废弛，博士传授之风气止息以后，学术中心移于家族，而家族复限于地域，故魏、晋、南北朝之学术、宗教皆与家族、地域两点不可分离。

河陇一隅所以经历东汉末、西晋、北朝长久之乱世而能保存汉代中原之学术者，不外前文所言家世与地域之二点，易言之，即公立学校之沦废，学术之中心移于家族，太学博士之传授变为家人父子之世业，所谓南北朝之家学者是也。又学术之传授既移于家族，则京邑与学术之关系不似前此之重要。当中原扰乱京洛丘墟之时，苟边隅之地尚能维持和平秩序，则家族之学术亦得藉以遗传不坠。刘石纷乱之时，中原之地悉为战区，独河西一隅自前凉张氏以后尚称治安，故其本土世家之学术既可以保存，外来避乱之儒英亦得就之传授，历时既久，其文化学术遂渐具地域性质，此河陇边隅之地所以与北朝及隋唐文化学术之全体有如是之密切关系也。<sup>③</sup>

从学理上说，家族是一种血缘性组织，是血缘性纵贯轴的基元。其存在具有地缘特征，氏族郡望不过是“血缘的空间投影”<sup>④</sup>。家

《潜研堂文集》卷二四。

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0 页。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7、19~20 页。

林安梧《儒学与中国传统社会之哲学省察——以“血缘性纵贯轴”为核心的理解与诠释》，学林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7 页。

⑤ 费孝通《乡土中国》，三联书店 1985 年版，第 74 页。

族既具有血缘与地缘的双重性，所以其与地域实际上是相互重叠、合二为一的。在地域文化研究中顾及到家族的因素，也就成了题中应有之意。而陈寅恪先生的一系列论述，与其说是给笔者提供了许多翔实的史料，毋宁说是方法论的深刻启迪。当然，柳诒徵、钱穆、岑仲勉、严耕望诸位史学大师对“地域一家族”研究方法亦颇多发明，并且都有示范性的成果，本书中多有借镜采录。

根据以上所提及的理论背景和研究方法，检视中国古代文学，特别是唐代文学的研究现状，笔者发现有如下特点：

首先，对文学创作与地理环境关系的认识，颇为深入，认为南北地域及其方土风气形成了南北文化和文学的差别，隋唐政治统一促使南北文化进一步交流融合，故文学的审美情趣和风格呈现出一种融合统一状态。政治的统一、文化的交流固然有助于弱化甚至一定程度上消融地域差别，但并不能彻底抹掉地域差别，由不同的地域特征所造成的作家气质禀赋、作品风格差别不仅在唐代依然存在，就是在此后的宋元明清，甚至现当代文学中依然存在。所以对统一时期地域差别的重视，可以使研究进一步深化。

其次，南北地域固然为重要的文化区分，但这种区分无论是从地理学还是文化学来看，仍嫌笼统。北方区域中关中、陇右、三晋、河洛、燕赵、齐鲁，南方区域中的荆楚、吴越、巴蜀、岭南等文化圈，其间固有相同一致处，但彼此的差别以及这种差别对文学的细微深入影响，在文学史研究中涉猎较少。以隋唐文学研究而言，讨论南北文化的差别和统一固有价值，如能同时兼顾东西的对峙与缓和，并进一步深入到江南、关东、关西、代北等不同区域中，探讨其与文学演生的关系，将更有意义。<sup>①</sup> 尤当指出的是，关中地域作为京畿所在，既有地域文化的特征，又因处于政

笔者在本课题的后续项目《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中华书局 2002 年版）一书中有进一步探讨，参见该书的第 1、第 2 两章内容。

治文化中心而具主流文化的特征，所谓贞元之会合，光岳之钟灵，故其对文学的影响也更形复杂。明人李东阳指出：“唐之盛时称作家在选列者，大抵多秦晋人也。盖周以诗教民，而唐以诗取士，畿甸之地，王化所先，文轨车书所聚，虽欲其不能，不可得也。”<sup>①</sup> 霍师松林在《唐诗与长安》一文中，曾有专门阐述，透辟精当，对笔者撰写此书启发良多。

第三，从家族文化的角度观照文学现象，近年来已经取得长足的进步。如对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士族制度与文化学术及文学创作的关系研究，涌现出不少颇有分量的成果，其中包括一些硕博学位论文<sup>②</sup>。但相形之下，对唐代家族或士族与文学的关联性研究，则显得很薄弱，已经问世的成果很少。其实，对此问题的提出，可以追溯到很早。明代胡应麟《诗薮》外编卷三发现唐代父子、兄弟、夫妻以文学并称者甚众，并且分别就父子、兄弟、父子兄弟、父子祖孙、夫妻诸项，举例加以说明。胡应麟还敏锐地指出：“唐著姓若崔、卢、韦、郑之类，赫奕天下，而崔尤著。盖自六朝、元魏时，已为甲族，其盛遂与唐终始。文皇首命群臣品第诸族，时以崔民干为第一。嗣后达官旣仕，史不绝书，而能诗之士弥众，他姓远弗如也。”他还随之信手罗列崔氏能诗者近六十人，然后总结说：“初唐之融，盛唐之颢，中唐之峒，晚唐之鲁，皆矫矫足当旗鼓。以唐诗人总之，占籍几十之一，可谓盛矣。”<sup>③</sup> 胡

<sup>①</sup>《麓堂诗话》，《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排印本下册，第1377页。

<sup>②</sup>《文史知识》1992年第6期。

<sup>③</sup>如[日]田仲一成《中国的宗族与戏剧》，中译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陈明《儒学的历史文化功能——士族：特殊形态的知识分子研究》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方北辰《魏晋南朝江东世家大族述论》，（台北）文津出版社1991年版；程章灿《陈郡阳夏谢氏：六朝文学士族之个案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年版；刘跃进《门阀士族与永明文学》三联书店1996年版；陈爽《世家大族与北朝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章义和《地域集团与南朝政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第167~174页。

氏的具体结论或可进一步商兑，但他所提出的问题以及所切入的视角，无疑亦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职是之故，本书试图探讨唐代时期关中地域土族演变与文学发展的种种关联性，并缘此对唐代关中文学进行文化透视，在如下方面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

第一，提出关中文化精神的范畴，指出关中文化精神是指关中地域所形成的文化传统，是关中文化所特有的价值观念和终极依据。通过对关中文化精神的建构，试图勾勒唐代关中文学发荣滋长的文化背景。

第二，从方土风气的角度来阐释关中文学趣味——雄深雅健，并具体阐释形成此趣味的的原因。从文化地理学的观点来看，文学趣味的形成，实系方土之风气，即地域文化诸要素在历史过程中积淀而成。通过对“雄深雅健”风尚形成的追溯，描述唐代关中文学特殊的美学氛围。

第三，土族是中古社会的一极重要特征，但有关唐代土族的状况，在学术界看法较分歧。笔者持唐代处于土族发展的转型期，土族的衰亡沦替在唐末五代的观点。本书侧重对“关中郡姓”和“城南韦杜，去天尺五”两个命题进行阐释，揭示出其中所包含的丰富的文化意涵。

第四，提出关中文学土族（或文学世家）的范畴，并从两个方面讨论唐代关中文学群体的形成。首先，从时间维度来考察关中文学土族的崛起，认为关中土族经历了一个从文到武，又由武到文，即从经史世家到武力强宗，再由武力强宗到文学世家的演生变迁过程。其次，关中文学群体的构成颇复杂，就地域和族姓来分析，分别有关中本土作家群，河东著姓和代北胡姓加盟关中文坛者，江南和山东士人播迁关中者等几部分组成。这是一个庞大而又松散的创作群体，关中士人与山东士人、江南士人一方面各具特色，呈鼎足之势，另一方面又因迁徙流动，促成交流融合。

第五，指出唐代官学虽衰微，但私学仍有新发展，关中士人重视家族教育，尤其强调文学教育。

第六，循此，对中晚唐政坛上的“牛李党争”这一重大事件进行检测，通过统计分析，发现“牛李党争”中两派核心人物的郡望分布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李党成员主要是山东郡姓士族，而牛党成员基本上属于关陇士族，牛李党争并非是士庶之争，而是士族之间的“圈内之争”。

第七，分别就苏绰文体改革、柳宗元古文与关中学术资源、舅叔向家族贯望等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试图通过文学现象个案的管锥，使人们对唐代关中文学有更深层次的认识。

、本书前七章为总论，力求从大处着眼，宏观把握。八、九、十章为分论，不求面面俱到，仅就所涉及的问题从一点开掘，尽量深入。附录则是相关问题及材料的考证。

本书虽偏重历史文化研究，但仍努力追求理论概括、文本分析与史料考证相结合的学术传统。在材料的运用上，除注意基本文献的考订外，还颇多留意海外汉学界的研究成果，使课题的确定和观点的提出，避免重复雷同，试图通过这一有关地域文学的题目实现与国际隋唐史和隋唐文学研究界的衔接对话。当然，因笔者僻处西北一隅，获取国内外学术新成果和资讯难免受到局限，所以，笔者的这种努力，与其说是一种成果展示，毋宁说是一种希望和追求。

关中地域水深土厚，关中文学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笔者虽然颇早就留意于此问题，且进行了数年的资料准备，力求排除各种干扰和诱惑，但因资质愚钝，学殖有限，只能将这一初步的成果提交出来。对于这一课题的研究而言，本书虽然只截取唐代一段，限定在与士族相关的文学现象中，但仍然只是问题的粗浅提出，而并非圆满圆融的解决。

# 第一章

## 关中地域与文化精神

文化精神是指作为本质要素和内在命脉的文化传统，是一种文化特有的价值观念系统，亦即一种文化哲学。这是文化中充满生命活力的具有原初性和本根性的基质。

文化精神一词是由英文 *ethos* 意译而来的，在西方近几十年的文化人类学著作中使用的频率很高，中文学术界或音译为“意索”或意译为“文化精神”、“民族精神”、“精神气质”。萨姆纳（W. G. Sumner）指出文化精神就是使一个群体不同于其他群体的那些特质的总和。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认为在文化内部赋予这种多样化性格的，是每一文化的主旋律，使文化具有一定模式的，也是该文化的主旋律，即民族精神（*ethos*）。所以，文化的民族精神是指一个民族筛选文化因素并对这些因素加上自己独自的形式和解释的心理态度。博克（P. K. Bock）也认为，文化精神一词是由人类学阐释的，用以描述价值系统整合性的一般模式和方向。卡迪纳（A. Kardiner）认为每一种文化都是以不同的生活目的和价值为其特点的，现代西方人的“基本人格”在四千至五千年的整个历史时期保存下来，极少变化，通过儿童的教养一代代复制下去。他所说的基本人格与文化精神说是一致的。克里福德·基尔兹（Clifford Geertz）则说一个既定文化的道德（和审美）方面及评价原理，被普遍地概括为“精神气质”（*ethos*）一词，而认知的、存在的方面被称为“世界观念”（*world view*）。一

个族群的精神气质是指他们生活的一种风气、特征、品性，是其道德与审美方式的基调，标志着此一族群对他们自己和所处世界的根本态度。精神气质与世界观念不仅互相影响，而且可以说二者互为基础。<sup>①</sup>

本章试图从文化精神的角度来检视关中地域文化，通过对已取得的研究成果的评价定位，提出关中文化精神（或简称关中精神）的范畴，描述关中文化精神的历史走向，并指出关中土族在传承与践履此精神时的苦心孤诣。在此基础上，重新整合关中文化精神的逻辑框架与理论内涵，以期对贯穿并影响唐代文学中的地域文化有更深层次的理解。笔者同时认为，在学理上对此精神的价值重估，也是复兴关中精神必要的知识前提。

## 一 本书所用“关中”概念的界定

关中，又称关西、关内、关右、山西。所谓的关本指函谷关，山指崤山。以其地在函谷关之西，故称关西，与关东相对。以其在诸关之内，又称关内。古人以西为右，以东为左，故又称关西为关右，与关左相对。关中因在崤山以西，又称山西，与山东相对。函谷关在今河南灵宝东北弘农河畔，其始建于崤山之上<sup>②</sup>，故函关崤山就成为东西地域分界的极重要标帜。

关中之称见于秦汉时期。但其范围说法不一。《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中说“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另一说“关

以上引述参见陈来《古代宗教学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6~7页。在古代文学研究方面，同门师兄邓小军教授的博士论文《唐代文学的文化精神》（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年版）已借用“文化精神”的理论观照唐代文学。笔者对文化精神的理解受到前列文献及学者的影响，但本章主要是从“地域一族”的角度来阐释文化精神的，虽与西人所用该范畴颇有近似处，但亦不尽相同。

函谷关曾有所变迁，汉武帝时向东迁徙，改置在今河南新安境内，一般称新安县的函谷关为新关，以别于原来的旧关。东汉末年，设关的地方又改在今陕西潼关县。参见史念海《古代的关中》见《河山集》第1集，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26页。

中自汧、雍以至河、华”。史念海先生取后一说，按照史先生的解释，所谓于天下三分之一，指秦未统一六国时的疆土，故《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改为“秦地天下三分之一”。因秦地还兼有今甘肃、四川等处。汧在今陕西千阳县，雍即今陕西凤翔县，皆在陇山之下。河指黄河，华则为华山。华山黄河相距不远，因而也可以说，关中指西自陇山、东至黄河的陕西中部。

关中所临之关究竟有多少，说法亦很分歧。潘岳《关中记》：“秦，西以陇关为界，东以函谷为界。二关之间，是为关中。”<sup>②</sup>《史记》卷七《项羽本纪》谓：“关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饶，可以都霸。”《集解》注引徐广曰：“东函谷 南武关 西散关 北萧关。”<sup>③</sup>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卷八秦纪三：“秦地西有陇关，东有函谷关，南有武关，北有临晋关，西南有散关。秦地居其中，故谓之关中。”则关中得名便有两关之间或四关、五关之中的不同说法。

关中的范围或泛指战国末年函谷关以西秦国故土，包括秦岭以南的汉中和巴蜀。如前引《史记·货殖列传》所谓“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或指秦岭以北陕西境，包括今甘肃陇西，如项羽三分关中封秦将，其中雍王在咸阳西，都废丘（今陕西兴平县东南），辖地包括陇西；塞王在咸阳以东，都栎阳（今陕西临潼县北）；翟王在上郡，都高奴（今陕西延安市），包括今陕北。有时专指今陕西关中盆地渭河平原。如前引《史记·货殖列传》：“关中自汧、雍以至河、华。……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则其所指不包括陇西与上郡。可见关中是一历史地理概念，

史念海《陕西在秦汉时期历史中的地位》，见《文史知识》1992年第6期。

《史记》卷八《高祖本纪》注引《三辅旧事》云：“西以散关为界，东以函谷为界，二关之中谓之关中。”见中华书局点校本第2册，第356页。

《史记》，中华书局点校本第1册，第315页。

④ 另外，根据王仲荦《北周地理志》卷一知，当时的关中包括雍、岐、陇、华、同、宜、敷、涇、豳、原、宁、延、丹、绶、银、夏、长、盐、灵等十九州。则其范围就更大了。参见《北周地理志》上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指义亦不尽相同，范围广狭亦有区别，不能一概而论。这种区别当与秦国在统一战争中迅速扩张、疆土逐渐扩大的历史过程相关<sup>①</sup>。本书所用关中概念主要取狭义即第三义，略相当于三辅政区，有时也使用第二义，略相当于三秦。但为了与昔哲今贤的研究成果相衔接，如包括陇西（今甘肃东部地区）时，一般则改用“关陇”以示区别。

其他关西、关右、关内、山西等术语指义与关中广狭不一，颇多交叉，歧说纷纭，本书在使用这些术语时，是将其作为关中的替换词，其义与前所界定的关中范畴的二、三义略等。

关中位处黄河中上游，北为陕北黄土高原，南为汉中盆地，渭河横贯，三渠分流，水利发达，土壤肥沃，故得以利用厚生。且诸关环卫，形势险要，控扼西北、西南与中原之户枢，为兵家用武之地，自古以来，视为帝乡。苏秦游说秦惠王时称：“秦四塞之国，被山带渭，东有关河，西为汉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马，此天府也。”<sup>②</sup>杜甫有“秦中自古帝王州”之说<sup>③</sup>杜佑说：“夫临制万国，尤惜大势。秦川是天下之上腴，关中为海内之雄地。巨唐受命本在于兹。”<sup>④</sup>缪希雍亦说：“关中者，天下之脊，中原之龙首也。”<sup>⑤</sup>均指出其地气灵秀，形胜便利。

在南方的长江流域尚未被充分开发时期，北方的汾涑流域与渭水盆地、伊洛平原便是政治、经济、文化的核心区域<sup>⑦</sup>。这一开

参见王子今《秦汉区域地理学的“大关中”概念》，《人文杂志》2003年第1期。

参见《辞海·地理分册（历史地理）》，上海辞书出版社1982年版，第100～101页；《汉代长安词典》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28页所引。

《史记》卷六九《苏秦列传》，中华书局点校本第7册，第2242页。

《杜诗详注》卷一七《秋兴八首》其六，中华书局点校本第4册，第1493页。

《通典》卷一七四，中华书局点校本第5册，第4546页。

⑥ 缪希雍《葬经翼》，转引自和文军《人文地理与中华伟人》，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63页。

⑦ 参见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1册，第163页。

发区以黄河及支流渭河为轴线，呈东西向分布。两汉的核心区仍为关中与三河，边陲区为会稽、南方诸郡及北方沿边诸郡国。关东和关西长期作为重要的两大区分<sup>②</sup>，故东西方的区分比较南北方的区分更有一种特殊意义。钱穆先生曾对此分析说：“两汉统一时期，代表中国政治中心而兼文化中心的地点有两个：一是长安，一是洛阳。长安代表的是中国东、西部之结合；首都居在最前线，领导著全国国力向外发展的一种斗争形势。洛阳代表的是中国的稳静状态，南、北部的融洽；首都居在中央，全国国力自由伸舒的一种和平形态。”<sup>③</sup>但长安与洛阳首先是关西和关东的象征。到了隋唐时期，虽然南方地区已获长足发展，以江左与河朔作为南北区域的代名词有着重要意义，但是在北方区域中再分辨关东与关西，仍未丧失其深刻的人文价值，隋唐崛起于西北，在此文化轴线上建长安、洛阳为东、西都，兼有了向外斗争进取以及向内平和伸舒的两种形势，十足地象征出中国大一统盛运之复临。<sup>④</sup>考察长安与洛阳所代表的东西方，特别是关中区域与大唐气象的错综复杂关系，正是本书所欲深入探讨的重点。

## 二 以往研究成果的评述与定位

关中文化源远流长，关中文化的研究亦由来已久。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中对关中文化已有大量的记录和零散的论述。此后每代都不乏弥足珍贵的记录。

参见许倬云《传统中国社会经济史的若干特性》，见氏著《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贵州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17页。

参见劳干《关东与关西的李姓和赵姓》，（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60年第31本。

钱穆《国史大纲》（修订本）上册，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34页。  
同上书，第236

北宋张载（横渠）的关学即为关中文化的一种哲学表述。关学兴起于关中，与濂、洛、闽学并称，既有时代根据，又有地域特色。张载《西铭》中的“民胞物与”思想，《近思录拾遗》中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sup>①</sup>，实为先儒仁学精神的全幅发扬，其再三致意且躬行践履者，多为关中文化之大节，扶微继绝之功自不可灭。横渠之后，开宗立派，瓜瓞绵绵，树标帜于思想史，应当大书特书。但同时应看到，关学作为宋代理学的一个支流，也具有理学的局限，其所上承下达之关中文化精神亦仅为片段而非全体，尤为重要者，因时势气运推移，关中学人的笃行实践，已很难促成关中文化的真正复兴。

从现代历史科学的角度研究总结关中文化最著名者，当推义宁陈寅恪。陈寅恪治中古史，提出“关陇集团”理论和“关中本位政策”说，借以解释隋唐制度渊源和唐代兴衰的原因，第一次从地缘政治学的角度对关中文化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他指出所谓的关陇文化“乃关陇区内保存之旧时汉族文化，以适应鲜卑六镇势力之环境，而产生之混合品”<sup>②</sup>；“李唐一族之所以崛起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sup>③</sup>；“李唐皇室本出于宇文泰之胡汉六镇关陇集团，实具关中、代北两系统之性质”<sup>④</sup>。陈氏的学说及理论模式具有原创性，故其观点为国际隋唐史学界广泛援引和评论。作为一代文化伟人与史学巨擘，陈氏理论的学术效应将如波澜声响，非止撼动历史学的远空，亦将不断回荡在三秦大地上，激发后来者步武前贤，更上一层楼。

笔者对关中文化精神的理解把握得益于陈氏者甚多，本书所

<sup>①</sup>《张载集》，中华书局点校本，第 62、376 页。

见氏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 2 页。

<sup>③</sup> 见氏著《金明馆丛稿二编》，第 303 页

见氏著《金明馆丛稿初编》，第 238 页

采用的“地域一家族”研究方法亦是由陈氏倡导并运用的，包括义宁陈先生在内的昔哲时贤的灼见特识，沾溉后学非止一端，亦如梦魇一样纠缠着后来者，虽竭尽全力想超越这些成果，但潜意识之中仍难免受其支配和影响。从学术创新角度来说，这是一种无奈的悲剧。但从有所本原的学术承传来看，这正说明一脉清泉渊源有自。

因其论题所限，陈氏“关陇集团”的理论亦不无争议之处，学者已多言及，兹不赘述。从陈氏立论来看，其侧重于政治、军事方面，着眼于统治集团的上层群体，且只用来解释隋唐制度渊源，他认为自武则天当政后，关陇集团及关中本位政策已遭破坏。换言之，陈氏只是用其说明西魏北周到唐前期的政治变迁，并未用以涵盖有唐一代，更未将其作为一个普泛的范畴来解释关中文化的始末源流。陈氏在分析研究武则天之后的关中士人时，即避而不提关陇集团或关陇士族之类词语，未能用其所倡导的“地域一家族”研究方法一以贯之，来考察关中文化与关中士人的兴衰变迁全过程。

检视陈著，发现他本人并没有对关中或关陇做严格的地理学界定，在其论述中关中或关陇两词经常互换，按照研究者对其理论的解释，关陇大致相当于“贞观十道”中关内、陇右两道所辖地域，随着关陇势力的扩张，关陇文化也有一个扩展过程，至北周时期，基本上成为覆盖北方大部分地域的主体文化<sup>③</sup>。关陇集团的支柱是府兵制，而府兵起始是鲜卑六镇势力，六镇虽然在唐以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象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03页。

参见汪荣祖《陈寅恪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17~118页所引。

<sup>③</sup> 参见尚定《走向盛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1~12页。

后说法不一<sup>①</sup>，但以诸家大致认同的怀朔、武川、抚冥、柔玄、怀荒、沃野等镇来说，均在今山西、内蒙古、河北一带，可见陈氏关中或关陇并非严格意义的地理概念，而是一个政治文化概念，其指义大致为除山东旧族外北方文化的代名词。

笔者对关中文化精神的把握和建构即缘此出发，司马迁、班固、杜佑等关中东学家的载录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张载等关学家又为解读关中文化提供了一把理学的钥匙，陈寅恪等现代史学家则为我们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可资参照的模式和具有示范意义的个案成果。本章在此基础上提出“关中文化精神”的范畴，并试图从历史与逻辑两个角度把握这一范畴所包涵的博大精深的意蕴。

### 三 关中文化精神的历史走向

作为一种地域文化所具有的价值观念和终极依据，关中文化精神有其独特的话语形式，经历了形成、发展、兴盛并衰微的过程，欲求对此精神玄赜奥义的深入理解，应当原其始末。既不能用张横渠的关学作为关中文化的代名词，又不能以李唐一姓之兴衰来理解关中精神的理论模式<sup>②</sup>。笔者以为，关中文化精神的描述，自当从这块黄土地上开始栖息、繁衍土著关中人开篇，周民族藉以发皇，西周礼乐制度的确立，标志着关中文化的第一次胜利和关中精神的初步形成，秦汉的相继崛起，则是关中精神的第二个高潮，隋唐因周秦旧壤，开创民族之空前机运，使关中精神出现第三次高潮。张横渠在高潮之后对关中文化进行了哲学回忆

参见《辞海·地理分册(历史地理)》第45页。

② 至于有论者将关陇集团等同于关陇文化，认为武则天变革科举制度，压制关陇集团，遂导致关陇文化的衰微(参见尚定《走向盛唐》，第100页)，则是笔者不能赞同的。

和理学思考，是关中文化精神理论的总结者。嗣后，关中精神在现实层面上便日渐衰微。换言之，西周文采、秦汉雄风、隋唐气象、宋明义理，各有特点。下面即循此对关中文化精神的历史走向进行一简略的扫描。

关中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化区系由来已久。关中境内发现的公王岭蓝田猿人、大荔猿人化石，说明人类社会已进入第一个组织形态——血缘家族阶段<sup>①</sup>，考古学界根据北到长城沿线及河套地区，南达汉水中上游，西抵甘肃、青海东部，东达豫东的上千处仰韶文化遗址得出陕西渭河流域本是仰韶文化中心的结论<sup>②</sup>。陕西的客省庄二期文化，相当于河南和山东地区的龙山文化，但是又具有独自的文化特征，这种文化遗存普遍分布于渭河流域的广大地区，又被称为“陕西龙山文化”<sup>③</sup>。徐旭生将传说时期的人群分为华夏、东夷和苗蛮三大集团，华夏集团包括两个“大亚族”，即姬姓的黄帝系和姜姓的炎帝系，这两支人群的最初居住地都在今陕西，后来逐渐向东迁徙和扩张，一直到达华北的东部。李学勤根据考古及文献等多重证据，将东周时代划分为七个文化圈，其中之一便是秦文化圈<sup>④</sup>，可见关中地域于华夏民族的发祥意义重大，且很早就独具特色，自成区系。

周人是活动在关中的一个古老的部落。《诗·大雅·生民》说周的始祖弃“即有邰家室”，证明周人最早的活动地区是在邰（今陕西武功境内）。周的始祖弃不仅在邰部落中成为氏族组织的首领，而且还在以舜、禹为首的华夏族部落联盟中担任了主管农业

张岂之《三秦思想文化特色》，《文史知识》1992年第6期。

黄新亚《华夏文化面面观——陕西考古成就巡礼》，《文史知识》，1992年第6期。

陕西省考古学会编《陕西考古重大发现（1949—1984）》，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2页。

见氏著《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40、44页。

见氏著《东周与秦代文明》（增订本），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12页。

的官职：稷。从此奠定了周人以天赐德基，世代耕稼，农德自重的传统。从后稷开始，周人已告别母系氏族制度，亲属关系按男系计算，说明此时已进入父系社会。到了公刘时，周人由邠迁到了豳（今陕西旬邑西南）<sup>①</sup>，公刘之后九世，迫于狄人的侵逼，古公亶父率周人“去豳，度漆、沮，逾梁山，止于岐下”<sup>②</sup>，岐下，就是岐山之下，其南有原隰，土地肥沃，适于发展农业，所谓的“周原旖旎，萁荼如飴”<sup>③</sup>。周人不断迁徙流动、开拓进取的精神亦可略见一斑。周为国号，亦从此开始。嗣后，文王受命，武王克商，周公摄政，周家从此成为天下共主，丰镐所在之关中便成为天下政治文化的中心。

周人对夏商等前代文化能因革损益，所谓“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sup>④</sup>，由此形成周人的文明，这便是为后世所称颂的礼乐制度。西周礼乐，内容繁富，说法不一，但核心是强调人文化成。《礼记·表記》中说“夏道尊命”、“殷人尊神”、“周人尊礼”<sup>⑤</sup>。《史记·高祖本纪》赞语也说殷以敬，周以文。可见殷商信仰自然宗教，属祭祀文化；而周人奉行伦理宗教，属礼乐文化<sup>⑥</sup>。关于周公测礼作乐虽有不同的说法，但其强调德治，认为天命不常，只有明德慎罚、敬天保民，才能做到以德配天<sup>⑦</sup>，《尚书·酒诰》说：“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孟子引佚《泰誓》也说：“天视自我民

钱穆认为豳的地望在今山西绛县，豳、邠为古今字，邠则得名于汾水，故周本起源于汾水，迁徙到甘陕之间，始称豳。参见氏著《周初地理考》，《燕京学报》1931年第10期。许倬云《西周史》从其说。斯维至则认为后稷之后周的一支迁往汾水流域，公刘时这一部分人又迁回豳。参见氏著《陕西通史·西周卷》，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6页。

① 《史记》卷四《周本纪》，中华书局点校本第1册，第114页。

② 《诗·大雅·绵》。

③ 《论语·八佾》，见刘宝楠《论语正义》卷三，中华书局点校本上册，第103页。

④ 《礼记训纂》卷三二，中华书局点校本，第792页。

⑤ 参见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第11页。

⑥ 参见斯维至著《陕西通史·西周卷》第4章第4节论述。